

論巴金的“火”

中文系三年級巴金創作研究小組

“火”是巴金抗戰時期的作品，一共分三部。寫作時間是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作者在“火”的第一部後記中這樣寫道：

“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並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我還想使人從一些簡單的年青人的活動里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看看作品是否實現了這一願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全面進攻中國開始了。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在這個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號召全民抗戰的偉大宣言，在“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口號鼓舞下，全國各地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抗戰運動。

“火”的第一部以“八一三”以後的上海抗戰作背景，寫了一羣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抗日救亡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現實。

作者以他正義的筆鋒作為鬥爭的武器，在我們面前畫出了一幅鮮明的殘酷的現實圖景。祖國大好河山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彈片在狂嘯，房屋在倒塌，人民扶老攜幼地逃難，血和淚染紅了祖國的土地……。在這嚴峻的現實面前，一羣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懷着滿腔的熱情，帶着強烈的仇恨，發出了憤怒的抗日的吼聲！他們組織了青年救亡團體，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青年學生劉波，從平靜的課堂走向了燃着戰火的大街。為了募捐，他到街頭去賣報紙；為了早日消滅共同的敵人，他熱情而又誠懇地幫助幾個朝鮮的愛國青年；為了工作的需要，他暫時拋下了個人的幸福，毅然決然地送走了素貞，告別了一同工作過的朋友，一個人單獨留在上海。劉波對馮文淑說過這麼一句強有力的話：“鳳凰在火中得到了新生，中國人民在火的洗禮中只會鍛煉得更堅強。”正是這樣，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和愛的鼓舞下，馮文淑的一顆純潔的少女的心點起了復仇的火種。她父親反對她到醫院工作，要她在家規規矩矩地“埋頭讀書”，以免“將來有危險。”她母親也不了解她。但馮文淑並沒有退縮，而是鼓起了勇氣，與她的“失敗主義者”的父親和那個准漢奸——馬先生作了頑強的鬥爭之後，象一匹脫韁的馬，勇猛地衝破了家庭的封鎖，投入到全民抗戰的洪流里去了。

和馮文淑不同，朱素貞默默無聞地離開了她那個冷冰冰的家庭，走向了火熱的鬥爭生活。而周欣却象一個幸運兒，當她一開始和年青的朋友們一道參加抗戰的行列的時候，就得到了她母親的支持和鼓勵。

巴金通過這一羣愛國青年的活動，尤其是通過這三個青年女性各不相同的生活遭迂，表

現了在民族危難的日子里，愛國的青年沒有袖手旁觀，而是果斷地參加了這場神聖的保衛戰。他們的呼聲也就代表了作者的呼聲。在當時說來，這種正義的呼聲，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召喚力量。

此外，作者還通過一個漢奸在街上遭到人民痛擊的場面，表現了他對賣國賊的強烈憎恨。在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比較隱晦地揭露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抵抗主義。

雖然我們在“火”的第一部，通過一羣青年知識分子的狂熱活動和作者對當時鐵與血的現實作一些真實描寫中，感到了一股嚴峻的時代氣息，看到了一點鬥爭的火光，但如果進一步分析和挖掘，就感到作品還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點。

我們認為：如果把一羣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由於民族正義感所引起的一陣狂熱活動，看成“黎明中國的希望”，那是極其錯誤的。

如所周知，當時抗戰的主力不是國民黨反動政府一潰千里的幾百萬大軍，也不是巴金所寫的一羣狂熱的青年知識分子，而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解放區人民組成的游擊武裝。正是由於這股強大的力量，才拖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部分兵力。由於八路軍許多次戰鬥的輝煌勝利，尤其是毛主席的著名論文“論持久戰”的發表，就大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的信心。只有這股力量才是“黎明中國的希望。”

但是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沒有深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鬥爭中去，所以他就看不到這一真理。

巴金錯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作了“黎明中國的希望”，把廣大的勞動人民看成是愚昧無知的，對抗戰漠不關心的。於是，悲觀沉郁的調子就很自然地在作品中出現了。悲觀、失望的人在當時是有的，但究竟是少數。它是不健康的情緒，對當時的抗戰起着促退的作用。但作者對此卻採取了自然主義的態度，有時不僅沒有指出其對革命的危險性，反而加以歌頌和讚揚。

有些評“火”的文章，也對“火”許多嚴重的錯誤，沒進行任何批判。如揚風同志在一篇題為“巴金論”（《人民文學》一九五七年七月號）的文章中，竟這樣寫道：

“巴金從這羣年青人身上看到了那‘黎明中國的希望’；通過這作品，巴金在他的讀者心中也燃燒起了那種‘希望’。”

“這第一部的‘火’就是熊熊的燎原的火”。

這是毫無原則的全盤肯定。如果按照揚風同志的觀點，把一羣小資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的狂熱活動當作“熊熊的燎原的火”，那麼，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戰主力又是什么呢？

“火”的第二部（一名馮文淑），完稿於一九四一年。作者寫的是以曾明遠為首的戰地工作團的活動情況。

這個戰地工作團的成員，也是一羣青年知識分子。上海淪陷後，他們就由曾明遠帶領到了後方。他們住在一個破爛堡內，過着比大上海要較為艱苦、樸素的生活。他們到人民中間去演戲、演說、貼自己所作的招貼畫，來宣傳抗日的道理。

在當時的現實生活里，不可否認這一份小小的力量是存在的，巴金看到了這一點，並把它寫了出來。這並不違反歷史的真實。他們小小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激起了人民羣眾對日本帝國主義更加強烈的憎恨。特別是楊文木那種帶病去宣傳、去演戲的工作精神，是使人感動的。它表現了當時愛國青年的一顆火熱的、對危難祖國之愛的、赤誠的心。

虽然这部小說也有这些可以肯定之点，但却絲毫不能掩盖住小說中所存在的比第一部更为严重的問題。

首先不得不指出，作者有意識地強調和誇大了青年知識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而沒有看到广大人民羣众的高度爱国热情和坚决抗日的行动。因而就出現了一些不正确的描写。例如作者这样写道：当战地工作团的成員——李南星他們还没有演說的时候，人民羣众的脸上布满了“疑虑”和“愁苦”，連話語里也“夹杂着沉重的調子”，甚至竟“不知道如何打鬼子”，“怕鬼子加倍地報復”，“怕誤了农事”。

当时全民抗战的主流，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領導的人民的軍隊和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游击武裝。日本侵略者，在这强力的打击下，惊心落魄，死亡沉重。我国人民羣众絕對不象作者所写的。虽然也有些人对抗战的信心不足，但这在人民中是少数。作者錯誤地把它当作了抗战现实的主流。因此，这是不真实的。

正因为巴金看不到人民羣众的偉大力量，所以就通过几个青年知識分子，到他們中間去做“启蒙”工作。似乎只有这些知識分子才真正懂得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事实上，他們高談其抗战、革命、赴湯蹈火的大道理，可是一旦需要他們的言論付之于实际行动时，他們就畏怯了，并且提出各种理由来掩盖自己恐惧的心情。在曾明远召开的一次討論关于撤退的會議上，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其实到处都是做工的地方。”他們这么說，“我們如果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那是很危险的。”“我們那个演剧队从徐州突围出来，路上还被敌人打死了一个隊員。那个同志的血和汗似乎浸入了他的心。”这不是貪生怕死么？！于是，“趁早撤退”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而以楊文木为首的比較正确的路綫却被排斥。这是两条路綫的斗争！并不象楊风同志所說的，“两条路綫都是正确的。”楊文木等三人离开工作团，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相反他們正是由于不滿意工作团的无政府主义的涣散状态，而要求繼續作緊張的实际斗争。所以他們比馮文淑之流要进步一些，当然还不能算理想的革命者。但在作者的笔下，楊文木等人却是以遭受羣众唾棄的形象而出現的。可見作者所歌頌的“革命”知識分子，不过是一羣貪生怕死的逃兵。

他們沒有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生死存亡的斗争，只是在大后方講講道理，发发議論，搞搞文艺活动，却居然獲得了作者崇高的评价。

作者为了誇大知識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于是把人民羣众貶成“阿斗”，将其形象歪曲和丑化。

这里，我們完全同意“論巴金創作中的几个問題”（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一文中下面的論点：巴金在这部作品中同样沒有反映出人民的力量——这始終是抗战的基本力量。

大概作者認為也就是由于“原始的”、“笨拙的”人民，导致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衰亡的”民族了吧！所以就把“黎明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小資产階級青年知識分子身上，想从他們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

当战地工作团要撤退到大別山区去的时候，作者把抗战的希望不是寄托在人民身上，而是寄托在王老师和国民党的走狗——杜保长的身上。这使人不得不为之憤然！

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之所以始終把劳动人民塞在一个狹窄的天地里，抹煞他們偉大的力量，將他們崇高、光輝的形象加以歪曲和丑化，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深处沒有劳动人民的感情。

此外，这部作品在艺术处理上，在某些地方也表现了自然主义色彩。

战地工作团的成员，虽然一双脚踏进了人民群众的门槛，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心交给人民。他们工作飘浮，成天打打闹闹，上馆子，赏月，观风景，谈恋爱……。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很快活，其实这并不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固然我们不能象“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的作者那样，把他们这种行动看成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但值得提出的是作者一览无余地把这支离破碎的与当时紧张、激烈的抗战气氛毫不协调的生活琐事全搜罗起来，使人读它的时候，有把鸡肉和鸡毛一起嚼的怪味。

如果说“火”的第一部还有一点火花，那么第二部就是在冒烟了。但是“巴金论”的作者扬风同志却在评价这部小说时下这么一个奇怪的结论：“巴金仍然大声地发出他那‘大家抗战去’的呐喊声，仍然燃着他那对日本侵略者仇恨和愤怒的火”，说“巴金真实地反映了、提出了——抗战应该怎样‘抗’？”这一问题。

我们要问扬风同志：假使中国的抗战是按照巴金的路线去“抗”的话，那么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一九四三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前夜。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打击人民力量，准备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288页）日本帝国主义也对解放区进行疯狂的进攻。虽然如此，解放区还是阳光普照；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力量的万道霞光从延安发射出来，冲破蒋管区深邃的黑暗，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就在这样一个民族自卫的烽火烧得最旺、内外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的年代里，巴金写成了“火”的第三部。

作为一个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写出来的作品，照理是应该热情洋溢、信心百倍和充满着战斗性的。但是当我们看完了这部小说之后，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在“火”的第三部中，虽然作者通过法西斯思想的奴才张翼谋、绰号野玫瑰的新交际花王文婉、鼻子下面留着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的黄文通和发国难财的温健等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当时蒋管区这样阴暗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作者对这些现象所怀的憎恶心理。但这些可以肯定的地方，并不能挽救这部作品根本性的失败的命运。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煞费苦心地塑造了田惠世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写了这个老人的“生与死”，表现了“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思想感情的交流”。

在巴金的笔下，田惠世是一个“善良”、“虔诚”、“谦恭”的基督徒。为了抗战，他“全力以赴地”去办“北辰”杂志。作者歌颂他一颗充满“爱”的心；歌颂他生命的“青春”；歌颂他的“战士的精神”。

但田惠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获得作者的歌颂和敬爱呢？

从青年时代起，田惠世的“心的门”就被新旧约中许多“新奇的教训紧紧地叩着”，于是，“他喜悦了”，“身体强健了”，“成了一个早熟的人”。医院“毕业”后，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诊所，但是当贫穷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向他的诊所走来的时候，“他的乐观似乎受伤了”。这时福音书就医治了他那心灵的“创伤”。当他每每读到主的关于“爱”的教训时，就“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于是对主的“默禱”，就成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要素。

抗日战争严峻的日子在他面前降临了，怎么办呢？现实又是不可“逃避”的。于是他办起了“北辰”，给抗战作“宣传”工作。这样，总算自己成为了抗战的“一员”，既能在

生前对得起“主”和“良心”，而死后也会在另一个“极乐世界得到灵魂的安宁”。

田惠世在这个时候创办“北辰”，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愿他这个“淘气的孩子”能在抗战中起些宣传作用，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献出一份力量。

但主要之点却在于：这份力量是极其软弱的，可以说，在抗战中，“北辰”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相反的，由于反动的人生哲学和信仰主宰着田惠世，想求得虚无的安静与梦幻的和平，所以他在“北辰”上大力宣扬的，就是逃避阶级斗争的所谓“主的爱”。他坚信“爱使生命繁荣，失去了它，就使生命枯萎”，“用牺牲代替谦卑、伪善的说教，用爱拯救世界”。这些，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在对立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容许这种“爱”存在的，因为对抗性的矛盾决不能用这种“博爱”来调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会因听了这种“爱”之后而大发“慈悲”，不再侵略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爱”而在敌人面前放下武器，那不是自取灭亡吗？因此，“北辰”在客观效果上不是对抗战有利，而是有害！因为它只能麻醉人民的精神，瓦解人民的斗志。

田惠世除了搞这一块挡箭牌之外，对于抗战他再也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了。

他的生活是十分平静的，“全家的人聚在一起吃饭、喝茶、谈天的时候，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和平、甜蜜的爱的空气。”他把这种苍白的生活当成一种“幸福”。他的结论是：“我并不是孤独的。”他的心里“非常畅快”，因为“上帝没有离弃他”。

说来也奇怪，恰好这时曾在“青年救亡团”和“战地工作团”工作过的冯文淑、朱素贞，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跑到这个老头子家里来了。冯文淑“一直是在閒着”。朱素贞居然还有一颗平静的心来唸书呢！她们都象古镇上的小市民坐茶馆似的在田惠世家里聊天，欣赏那“落山的太阳”、“兰绸似的天幕”和“古旧的城楼”。他们静坐在楼阁里说说笑笑，有时也客客气气地争论一下关于“爱”和“主”的问题。

这就是作者所描写的正当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大后方的生活环境！如果不是间或在小说里读到“警报”、“飞机”、“炸弹”之类，那读者会把这当成十八世纪深山林里的寺院。

这种“静穆”的气氛与战火纷飞的抗战现实是多么不协调啊！

作者为了表现田惠世精神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就慷慨地送给了他一夥捧场的角色。田惠世的儿子世清说：“你是个好人，顶好顶好的人。”冯文淑说：“我觉得他很可爱。”朱素贞说：“我也喜欢他，他是个难得的好人。”甚至连参加过保卫连云港战斗而负伤的洪大文也这么恭维：“老先生，你的思想怎么会这样清楚、高超！”他与其说是一个伤兵，倒不如说是一个绅士！

田惠世真如这些人所恭维的那样？当冯文淑和他谈到革命者的时候，他说道：“一个花园里面花也有，草也有，不能全是好的。”我们革命者是不相信什么“博爱”的，而主张阶级斗争。但基督教的宗旨则是“和善、谦卑、并且给人类许多未来的福，他反对战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把人类催入甜蜜的睡眠……”这种信仰在我们革命者是决不会产生的。因此田惠世把革命者就不看做是花，而叫草。从这里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出田惠世思想上的反动本质。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的基督徒，作者自始至终是加以赞扬的。田惠世死了，巴金还在说：“我们怎么能把死当作终结呢？绵延不断的生命和长春的树木正在对我们讲说永生。”难怪在他死后，还有那么多他事业的继承者到坟上来吊唁，其中还有作者当作革命者而刻划

的馮文淑！在后記中，作者写道：“对真正相信基督教訓的教徒，我是怀着敬意的。”这实际上是反映出作者对抗日前途的絕望心情，于是就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自己所理想的基督徒身上了。

因此，我們認為，“火”的第三部是一部政治傾向性很强的反現實主義的作品。

火！是光明的信号，能照亮黑暗，燒燬一切反动、腐朽的事物，給人們帶來力量和希望。

但是巴金的“火”却不是这样！这具体地体现在作品中人物的命运的結局上。在第一部中我們可以看到主人公們由于一种小資产阶级的狂热而产生的一股生命力，虽然这种力量还不算太旺，但总可以看到一縷火光；但到第二部中，主人公們多是因受到挫折而轉入消沉了；到了第三部，他們不是一个个各自分散，就是一个个蛻化、墮落了。刘波要“換換空气”，因为他厌恶了上海的斗争生活；馮文淑后来“終日閒着，无所事事”；朱素貞結果被敌人枪斃，因为她指使了一个暗杀活动。

巴金作品中主人公这样的結局，早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灭亡”中就强烈地表現出来了。主角杜大心就是一个极度憂郁的人物，一生都在絕望的悬崖上徘徊，心里沒有人民，也压根儿不知道革命，最后由于个人主义的总爆发，就在一次未成的暗杀中灭亡了。这是因为那时无政府主义和虛无主义在作者的世界观中严重地存在，几乎占了統治地位，因此只感到現實的黑暗，而看不到未来世界的光明，用巴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似乎生下来就帶有阴郁性”，“追求的乃是痛苦”，从而也就无法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三年，巴金的創作生活經歷了十几年的時間。在这段历史时期內，中国革命已經獲得蓬蓬勃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民在井崗山上建立了紅色政权，先后打垮了蔣介石好几次大規模的“圍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工农紅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經歷了偉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陝北延安，領導全国人民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愈来愈猙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已普遍深入人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已由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經驗所丰富而发展了，象阳光普照在全中国……。

虽然客观現實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是存留在巴金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沒有得到动摇；同时，由于他与人民之間仍然有一段距离，因此党所領導的偉大的全民抗战运动，在巴金的笔下就以这样的面貌出現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在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中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作者用他的笔作武器，向敌人冲锋陷陣。但是，巴金的作品在这方面，並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59年2月于珞珈山